第 52 卷 第 5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2, No. 5
2015 年 9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ep. 2015

文学研究

# 论北宋诗学典范的选择及其得失
## ——以杜甫为例

祝尚书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成都 610064)

**摘　要：** 在北宋诗坛,杨亿选择李商隐为西昆派的诗学典范;晏殊则“取少陵多”;欧阳修谓韩愈为绝伦,不甚喜杜诗;而江西派又以杜甫为“诗祖”。通过杜甫由“村夫子”到“诗祖”的地位逆转,可以看到北宋诗坛诗学典范选择的利弊得失。典范选择在诗歌创作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又难免一偏,可谓利弊并存,得失兼具。

**关键词：** 诗学典范;杜甫;杨亿;欧阳修;黄庭坚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5)05-0025-08

## 一、问题的提出

在唐代诗歌大繁荣和五代文学极度衰微之后,宋初诗人有些手足无措:他们既有“无俾唐文,独称往昔”①的雄心壮志,但在“唐文”特别是诗坛巨匠林立的唐人面前,又十分踌躇和尴尬——在这个新王朝的文化建设中,连诗歌发展的道路也得重新摸索。显然,他们选择了学唐的策略,然后在“学”的过程中逐步创新。这无疑是正确的,毋庸多论;但学唐又该取什么路径?或者说,他们到底应学哪家哪派?以何种方式学?这很难有统一的认识。《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四引《蔡宽夫诗话》曰:“仲贤(郑文宝)当前辈未贵杜诗,独知爱尚,往往造语警拔。”又《宋诗抄·小畜集抄序》亦曰:“穆修、尹洙为古文于人所不为之时,元之(王禹偁)则为杜诗于人所不为之时者也。”可见,宋人是以选择典范作为突破口,而较早的选择之一是杜甫。但如王禹偁所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②——对学杜似乎信心不足,所以他只是宋初“白体诗派”的代表诗人,将白居易作为创作典范。除白体外,当时还有学贾岛、姚合晚唐体的,都各有自己的队伍,而形成所谓“诗派”。总之,宋初诗人学唐,是以“抱团”的方式出现在文学史上的。自觉的“抱团”,便成了自觉的诗派,它是典范确立的必然结果,此不论。

不久,“西昆派”首领杨亿崛起。所谓“西昆派”,南宋作家、诗论家葛立方曾作过简洁而准确的表述:“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亿)与王鼎、王绰号‘江东三虎’,诗格与钱、刘亦绝相类,谓之‘西昆体’,大率效李义山(商隐)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③“抱团”效法李义山也就罢了,但这派诗人又对其他唐诗大家采取排斥态度,于是麻烦来了。刘攽《中山诗话》曰:

> 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乡人有强

**收稿日期:** 2015-03-01
**作者简介:** 祝尚书,男,四川阆中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① 孙何:《文箴》,《皇朝文鉴》卷七二。

② 《前赋春居杂兴诗二首间半岁不复省视因长男嘉佑读杜工部集见语意颇有相类者咨于予且意予窃之也予喜而作诗聊以自贺》,《小畜集》卷九,《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韵语阳秋》卷二,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499 页。

大年者续杜句,曰“江汉思归客”,杨亦属对,乡人徐举“乾坤一腐儒”,杨默然若少屈。

视诗圣为“村夫子”,这颇有些惊世骇俗。自韩愈“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的名句出,李、杜孰优孰劣本已不成问题,他们是唐代两峰并峙、双星同耀的大诗人;而在杨亿眼里,杜甫不过是“村夫子”,让人情何以堪? 这凸现了这群诗人的排斥异己的宗派特色。到北宋末,“江西诗派”径以杜甫为“诗祖”,杜甫的地位发生了大逆转。这颇具“戏剧性”。看来,北宋诗坛的典范选择显得丰富且更换频繁,这中间有无规律可循,它的得失利弊如何? 很值得研究,但学界对此似乎关注不够。本文拟围绕杜甫由“村夫子”到“诗祖”的角色转换,对北宋诗坛典范选择的利弊得失与诗学发展走向作些探讨。

## 二、杨亿的典范选择与“村夫子”论

“村夫子”是西昆派首领杨亿在典范选择过程中提出的。要弄清这个命题的意思,还得从所谓“村夫子”的内涵说起。南宋四川作家李石说:

雅道不复作。至于子美、太白,天下无异议,退之(韩愈)晚尤知敬而仰之。唐人多任务巧,退之以为余事,其有取于李、杜者,雅道之在故也。近世杨大年尚西昆体,主李义山(商隐)句法,往往摘子美之短而陋之曰“村夫子语”,人亦莫或信。何者? 子美诗固多变,其变者必有说,善说诗者固不患其变,而患其不合于理,理苟在焉,虽其变无害也。①

从字面看,“村夫子”乃指乡村文人,古代特指农村中的教书先生,他们学问不大,议论往往平庸可笑,但杨亿所论乃诗人,显然又不止此。朱弁《曲洧旧闻》卷八曰:“世传《珞琭三命赋》,不知何人所作。……今其赋气质弱,辞语儇浅,去古人远甚,殆近世村夫子所为也。”据此,则所谓“村夫子”殆有两层含义:一是气质,二是辞翰。气质弱,盖指见识短,格局小,所作内容肤浅贫乏,不足与论大道;“辞语儇浅”的意思很明白,即谓诗歌语言质野,与“雅丽”相对。总之,“村夫子”是个贬义词,指的是诗歌俗气,不登大雅之堂。李石还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杨亿“往往摘子美之短而陋之”,即杨亿小看杜甫,自有他的“根据”,只是杨亿所摘“子美之短”没有流传下来,唯留下干瘪瘪的“村夫子”三个字而已。在李石看来,杜甫、李白正是雅道之所在,杜诗虽多变,但变得“合理”,并不害其雅。而杨亿为何置“天下无异议”于不顾,要“陋之曰村夫子”,鄙之为“俗”呢? 其实,这关系到他对审美价值、创作道路的选择,非“村夫子”一语可了。为弄清此点,我们不得不以杨亿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与杜甫略作比较,去寻找根源之所在。

上引李石说:“近世杨大年尚西昆体,主李义山句法。”杨亿曾对玉溪(李商隐自号玉溪子)诗有一番读后感,道:

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诗》百余篇,意甚爱之,而未得其深趣。咸平、景德间,因演纶之暇,遍寻前代名公诗集,观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久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曲尽万态之变,精索难言之要,使学者少窥其一斑,略得其余光,若涤肠而换骨矣。②

在这里,杨亿除惊叹李商隐诗歌的词采外,对他的艺术表达才能十分推崇,如谓其“包蕴密致,演绎平畅”云云,在他眼里,义山诗真到了无以复加、精美绝伦的地步。显然,他选择李商隐为诗学典范,出发点是“李义山句法”,并由此形成了自己较系统的创作方法论。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写道:“予景德中,忝佐修书之任……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由此可知,在杨亿的创作方法论中,“研味前作”是基础,而事典的繁富,语言的平畅有味,长于变化,善道精微难言之义,又建构起了较完整的艺术审美体系。应当特别留意“研味前作,挹其芳润”两句,前句说杨亿与其同好作诗是从书本中发掘题材和语料,后者是说以采摘前人作品中的“芳润”词藻和典故为表达手段。

我们知道,杜诗的代表作诞生于“安史之乱”

① 李石:《何南仲分类杜诗叙》,《方舟集》卷一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江少虞编:《事实类苑》卷三四“玉溪生”条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见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文字略有不同。

腥风血雨的艰难岁月,而杜甫的身份,就是一个拖家带口、南北飘泊的难民。因此杜诗取材于现实生活而非“遗编”“前作”,书写的是“当下”而非故事①,关心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表达的是烽火连天中广大穷苦百姓的喜怒哀乐,因而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惊心动魄、沁人心脾的诗句。但在知制诰、翰林学士杨亿眼里,这些都是浅俗的“村夫子语”,与他用雅丽语、“富贵语”②描写帝王事迹、朝廷典礼不在一个层级。杨亿也承认他的作品是“雕篆之文”——“亦由凫鹤之质自然,胡能损益;姜桂之性素定,岂可变迁”③,谓其好雕篆为文乃出自本性,难以更改。要之,杜甫、杨亿二人像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很少有契合点。明白这点,杨亿称杜甫为“村夫子”就不难理解了。李商隐虽一生并不顺利,但他毕竟是入过馆阁的“官人”④,这与杨亿相同,故他唯美的诗歌艺术,能引起杨亿的强烈共鸣。由此可见,诗歌典范的选择既关乎艺术的认同,更关乎人生遭际、社会地位的相近。

“西昆派”在当时影响很大。欧阳修《六一诗话》说:“盖自杨、刘(筠)唱和,《西昆集》行……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所谓“唐贤”,据其下文,主要指杜甫。南宋初人程敦厚《晏元献公紫微集序》说得更直白:“夫诗至唐律,无遗功矣。而谓该极雅丽,包蕴密致,曲尽万态之变,精索群言之要。昔杨文公(亿)论独尊玉溪生焉,李、杜之作几废而不行。”⑤可见,无论后世如何责怪杨亿“村夫子”论的不合理情,但至少在宋真宗时代,标举和选择李商隐,曾得到社会的认同。

## 三、欧阳修“不甚喜杜诗”辨

由杨亿评杜甫为“村夫子”,又引出另一个话题:欧阳修也不太喜欢杜甫。前引刘攽《中山诗话》在记载“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后,继续写道:

> 欧公亦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吏部于唐世文章,未尝屈下,独称道李、杜不已。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然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趠飞扬为感动也。

这里有一点应引起注意:对欧阳修的不喜杜诗,刘攽用了一个程度限制语“不甚”,就是说,欧的不喜杜甫并不是绝对的,只是不太喜欢而已,他不像杨亿那样决绝和刻薄,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干脆骂杜甫为“村夫子”。对欧不甚喜杜一事,南宋作家陈岩肖以为是“后人之言”,他在所著《庚溪诗话》卷上曾提出过质疑:

> 世谓六一居士欧阳永叔不好杜少陵诗。观《六一诗话》载:陈从易舍人初得杜集旧本,多脱误,其《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其后得善本,乃“身轻一鸟过”。陈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不能到也。
>
> 又曰:“唐之晚年,无复李、杜豪放之格,但务以精意相高而已。”
>
> 又《集古目录》曰:“秦《峄山碑》非真,杜甫直谓枣木传刻尔。杜有《李潮八分小传歌》,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故也。六一于杜诗既称其虽一字人不能到,又称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证碑刻之真伪,讵可谓六一不好之乎?后人之言,未可信也。

所辩有些牵强,读杜熟并不等于就一定喜爱,更不等于以他为创作典范。欧不甚喜杜当非杜撰,应是确有其事,在他所作《李白杜甫诗优劣说》中,就明显表露了这一倾向,曰:“‘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䍦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

---

① 《庚溪诗话》卷上:“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历代诗话续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67 页)

② 明末清初诗评家冯班将晏殊的《寓意》诗与西昆体比较后说:“昆体多用富贵语。”见《瀛奎律髓汇评》卷五,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8 页。

③ 《武夷新集序》,《武夷新集》卷首,《浦城丛书》本。

④ 李商隐曾任秘书省校书郎,见《旧唐书》本传;其任秘书省正字,见所作《请卢尚书撰李氏仲姊河东裴氏夫人志文状》,曰:“会昌二年(842),商隐改选天官,正书秘阁。”

⑤ 《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六一,影印续修《四库全书》本。

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①,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②因此,周密的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他在《齐东野语》中写道:

> 人各有好恶,于书亦然。前辈如杜子美不喜陶诗,欧阳公不喜杜诗,苏明允不喜扬子(雄),坡翁不喜《史记》。……若酸咸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之胸中无真识,随时好恶,逐人步趋而然者。③

如果说欧阳修也像杨亿那样排斥杜甫,当非事实,诚如陈岩肖所辨;但欧公刻意学韩,如《中山诗话》所说“谓韩吏部绝伦”,则“不甚喜杜诗”是可能的,也完全可以理解。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曰:“欧阳公于诗,主韩退之,不主杜子美。刘中原父(敞)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之句有俗气,退之决不道也。’中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门馆,晨有僧来谒”之句之类耳。’公(欧阳修)赏中原父之辩,一笑也。”(有学者曲为之说,一定要杜诗句法比韩愈更高明,则无必要,如明曹安《谰言长语》引邵氏上述欧、刘事后,曰:“人之好恶不同有如此。殊不知杜二句起得平直,似鄙俚,通篇变化之妙,意兼比兴,试取而味之自见。”)由此看来,欧不甚喜杜,也有雅、俗方面的认识差异,但如上引,他承认杜诗某些方面较太白更“精强”。或如秦观所说:“杜子美之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桢之诗长于豪迈,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子美穷高妙之格,极豪迈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子之长,子美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④则杜诗乃集诸家之长,浩瀚如大海,学之极难,不如韩之有法可学。这与南宋诗家多学黄而少学苏正相同。我们在谈论欧阳修“不甚喜杜”的同时,还不应忘记前引刘攽《中山诗话》下面紧接着的两句:“然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趠飞扬为感动也。”这就是说,对于韩愈诗,欧阳修虽十分推崇,誉之为“绝伦”,但与杨亿不同,他并不囿于一家,因此欧诗的底色是韩,但又植入了李白的基因,所以苏轼尝论之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⑤

综上论,欧阳修是杨亿之后又一个不喜杜诗的诗人——尽管他只是“不甚喜”,不喜的程度逊于杨,但他的诗学渊源是韩愈及李白,而不是杜甫,更不是李商隐。这无疑为北宋前期诗歌典范的选择增加了变数,注定了宋人对典范选择的开放性和宋诗风格的多样性。

## 四、江西“诗祖”:杜甫地位的逆转

我们再循着杨亿的“村夫子”论,走向变幻莫测的北宋中、后期诗坛。这里还需要补充一个人,那就是曾作过宰相的晏殊(991—1055)。他既是杨亿之后西昆派的实际领袖,也是欧阳修的老师。《古今诗话》曰:“晏元献(按:晏殊谥元献)取少陵多,取太白少。”⑥如此说来,晏殊的诗学理念不仅异于杨亿,也不同于欧阳修。由杨亿的“村夫子”论到晏殊的“取少陵多”,正好是否定之否定,再到欧阳修的“谓韩吏部绝伦”、对“李白而甚赏爱”,则又在唐诗大家、名家中找到了新的典范。在真宗、仁宗年代,诗坛的变迁真令人眼花缭乱,他们共涉及四位唐诗巨擘:李白、杜甫、韩愈及李商隐,而四人又分别代表了盛、中、晚三唐。

我们勿须深责杨亿。历唐末五代之乱、在文学极度衰落的宋初,文学——首先是诗歌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都在探索之

① 按:“落日欲没”四句及“清风明月”两句,皆出李白《襄阳歌》,见《李太白文集》卷五,成都:巴蜀书社 1987 年影印宋刻本。
② 《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九《笔说》,《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齐东野语》卷一六《性所不喜》,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03 页。
④ 《韩愈论》,《淮海先生文集》卷二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 苏轼:《六一居士集叙》。其实韩乃学杜,《后村诗话》曰:“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
⑥ 《诗话总龟》前集卷六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0 页。

中,真所谓“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①。杨亿选择了李商隐,在当时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他从古人文集特别是李商隐的诗歌中明白了什么是才调、雅丽,以及“曲尽万态之变,精索难言之要”的诗意美,这对宋初文学的复兴,具有启蒙、奠基之功。但也必须承认,过分强调“富艳”,又从“故作”中寻找创作资源,未免偏颇;而李商隐的诗歌虽然杰出,但艺术上的缺陷也不小,如南宋初诗论家张戒所说:“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②选作典范并不太恰当。而晏殊选择杜甫,欧阳修选择韩愈、李白,无疑都继承了唐代优秀的诗学遗产,乃严羽所谓“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③。由是观之,当时的诗坛领袖们经历了否定之否定、选择之再选择,最后确立了欧阳修发展宋诗的道路:既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④,又吸收李白的诗歌“超趠飞扬”的风格,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宋诗”风貌,在学唐中实现了创新。以是观之,我们认为杨亿尊义山而贬杜甫为“村夫子”,不过是宋人诗学典范选择中的一次不算成功的尝试,过或大于功而已。

选择仍没有结束。晏殊“取少陵多”,并不表明他是杜甫式的一流诗人。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他学韩愈、李白,也不意味着杜甫的影响从宋代诗坛上出局。诗歌是发展的,诗人的认识是动态的。前引程敦厚在《晏元献公紫微集序》又说:“夫诗至唐律,无遗功矣。而谓该极雅丽,包蕴密致,曲尽万态之变,精索群言之要,昔杨文公论独尊玉溪生焉,李、杜之作几废而不行。……近世则皆苏、黄,而以李、杜为初祖,其攻玉溪唯恐不力。”叶适《徐斯远文集序》也说:“自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⑤“唐人之学”专指晚唐李商隐的律诗学,到“江西派”学杜诗之直致及“无一字无来处”⑥,然后一反宋初以来风气,于是诞生了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以黄庭坚为领袖,但其诗学典范却是三百年多前的杜甫。苕溪渔隐(胡仔)尝曰:“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故陈无已(师道)曰:‘豫章(黄庭坚)之学博矣,而得法于少陵,故其诗近之。’……江西平日语学者为诗旨趣,亦独宗少陵一人而已。”⑦更明确地指出杜甫为江西派“诗祖”的,是宋末元初作家方回。他在所编《瀛奎律髓》卷一六“节序类”陈与义(号简斋居士)《道中寒食二首》诗下评论道:

> 予平生持所见,以老杜为祖,老杜同时诸人皆可伯仲。宋以后山谷一也,后山二也,简斋为三,吕居仁为四,曾茶山(几)为五,其他与茶山伯仲亦有之,此诗之正派也。余皆傍支别流,得斯文之一体者也。⑧

他又在评《瀛奎律髓》卷二六“变体类”陈与义《清明》诗时写道:

> 呜呼! 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余可预配享者有数焉。⑨

“一祖三宗”说颇遭后世学者诟病,或以为是方回硬拉杜甫为江西派作“祖”,其实并不然,从上引已可看出,认为江西祖杜的早有人在,方回并非杜撰。上引苕溪渔隐屡称江西诗派诗“宗杜甫”“独宗少陵”,说明至少江西派自己就是这样标榜的,而江西派的代表诗人如黄庭坚、陈师道等,至少在诗法上的确是认真学杜的,并且总结了不少学杜的具体法门。这里略举三例。一是黄庭坚论杜诗

---

① 蒋士铨:《辨诗》,《忠雅堂诗集》卷一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464 页。
③ 《沧浪诗话·诗辨》,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 页。
④ 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黄庭坚语曰:“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历代诗话》上册,第 303 页。
⑤ 《水心文集》卷一二。《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14 页。
⑥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一八,第二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5 页。
⑦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32 页。
⑧ 《瀛奎律髓汇评》卷一六,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91 页。
⑨ 《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六,中册,第 1149 页。

用事,他说:

>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①

我们知道,山谷诗极喜用典,又善用僻典,而且发明了著名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法。在黄庭坚眼里,这正是向杜甫学来的。

二是江西派“三宗”之一陈师道(字无已)论作诗立格、命意、用字之法。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载:

> 陈无已先生语予曰:“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像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谒玄元皇帝庙》诗叙述功德,反复致意,事核而理长;《阆中歌》辞致峭丽,语脉新奇,句清而体好,兹非立格之妙乎?《江汉诗》言乾坤之大,腐儒无所寄其身;《缚鸡行》言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兹非命意之深乎?《赠蔡希鲁诗》云‘身轻一鸟过’,力在一‘过’字;《徐步》诗云‘花蕊上蜂须’,功在一‘上’字,兹非用字之精乎?学者体其格,高其意,炼其字,则自然有合矣,何必规规然仿像之乎!”②

陈师道不是从理论上阐释如何立格、命意、用字,而是用杜诗直观地说明如何使立格有体、命意高远、炼字精粹。

三是陈师道论诗的奇、工、新。他说:

> 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③

诗歌的奇、工、新,是诗人们努力追求、但又难以具体表述的艺术境界和美学效果。陈氏的意思是,在宋代大诗人中,王、苏、黄三人分别以工、新、奇著名,但杜甫包三者而有之,他是以“常”为奇,以“易”为工,以“陈”为新,不刻意追求奇、工、新,而自然奇、工、新——这才是奇、工、新的最高层次。

在北宋诗坛诗歌典范的选择中,杜甫由宋初的“村夫子”到江西派的“诗祖”,虽然这之前已有人学杜,但声势不大,学理性不强,而只有到这时,杜甫和杜诗又才出现逆转,恢复和巩固了在诗歌史上本已享有的崇高地位。这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在经过历史抉择后对杜甫的再认识,是对优秀诗学传统更理性的继承。只可惜江西诗人所继承和发扬的多在技术层面(这将在下节论及),但他们选择杜甫为典范,仍值得充分肯定。

## 五 、典范选择:一盘没有结局的“局”

上面我们简要梳理了北宋诗坛重要诗派和诗人的诗学典范选择。之所以专论北宋,是因为南宋之后似乎已难有新意,甚至只是北宋的重复,比如南宋中叶起又逐渐回归晚唐体是也。要而言之,典范的确立容易使创作风格相同或相近的诗人“抱团”式地汇集在一块,组成带有宗派性的社团(哪怕是松散的),并不断扩大队伍,让诗歌创作出现集团化、模式化,并利用编刊诗集如《西昆酬唱集》《江西诗派诗集》等以扩大影响。这对繁荣文学创作和厘正文学发展的方向,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北宋看,诗人们的典范选择对象都是唐代著名诗人,典范们的成就对先进文学思想和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对后代创作水平的提高,其促进作用毋庸置疑。但问题也不少。如果我们梳理前面所述,典范选择的角度大约有三:一是醉心于古人的雅词丽藻,如杨亿;二是景仰前贤的艺术创新,如欧阳修;三是着眼于字法、句法等写作技巧,如黄庭坚、陈师道。对宋代诗歌发展来说,上述每一项都很重要,但又难免一偏:重雅丽者流于诗歌语言的靡丽;重创新者乃颠覆传统,以

---

① 《答洪驹父书》,《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一八,第 474 页。
② 《珊瑚钩诗话》卷二,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 464 页。
③ 《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 306 页。

文为诗①;重技巧者又少涵泳之旨②。因此,典范并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而只是各取所需,投其所好,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炫人眼目的“招牌”。这对文学事业来说,结果可谓利弊并存,得失兼具。

首先,选择前代某著名诗人为典范,初学诗者犹可,若一生在他人门前讨生活,终不免寄人篱下,难觅出路。楼钥说:“工部之诗,真有参造化之妙,别是一种肺肝,兼备众体,间见层出,不可端倪。忠义感慨,忧世愤激,一饭不忘君,此其所以为诗人冠冕。后人着意形似,亦有可杂之诗中而不可辨者;至其奔逸绝尘,虽诸名公恐未免瞠乎若后,此难与不知者道也。”③他是说,诗人如果落到“着意形似”、没有自家面目的地步,哪怕所学的典范是“圣”是“仙”,学得极“像”,也免不了模仿、“山寨”的悲哀。杨万里《诚斋荆溪集序》以自己在学诗道路上的失败与成功,曾深有感触地写道:

> 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其夏之官荆溪。既抵官下,阅讼牒,理邦赋,惟朱墨之为亲,诗意时往日来于予怀,欲作未暇也。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寤,于是辞谢唐人及王(安石)、陈(师道)、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盖诗人之病去体,将有日矣。方是时,不惟未觉作诗之难,亦未觉作州之难也。④

杨万里所谓“辞谢”诸家,并不等于决裂,只是入于此而出于彼,学其神而遗其形,这样才能避免模仿之弊,以臻于既学有根柢、又着力创新的高度,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跨越。南宋诗人戴昺,其从祖、著名江湖诗人戴复古称他“不学晚唐体,曾闻大雅音”⑤。昺尝作《有妄论宋唐诗体者答之》诗,曰:

> 不用雕镂呕肺肠,辞能达意即文章。性情元自无今古,格律何须辨宋唐?人道凤箫谐律吕,谁知牛铎有宫商。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光芒万丈长。⑥

杨万里为其集作序,特全引是诗,盖心同此理,惺惺相惜也。

其次,文学创作是精神生产,站在前人的肩上自然可以少走许多弯路。但从前述可知,北宋诗人典范选择的条件和角度,基本上停留在词藻或字法、句法等技术或艺术层面,而对诗人的人格、品质等“诗外”功夫很少顾及。如此学习最多只能得其皮毛,就是技术、艺术也很难踵武前贤。金代作家王若虚曾指出:“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辞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尝有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而门徒亲党以衣钵相传,号称法嗣,岂诗之真理也哉!”他又说:“朱少章论江西律诗,以为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全之地。予谓用昆体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浑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无事乎昆体功夫,盖二者不能相兼耳。”⑦非“真理”,“不相兼”,说得极对。倒不是后人与古人“智商”有差距,而是中间缺了一个关键元素:文学精神,也就是前引楼钥所说的“忠义感慨,忧世愤激”的人文关怀和诗人情怀。所以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有诗道:“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

---

① 王十朋《读东坡诗》:“学江西诗者,谓苏不如黄。又言韩、欧二公诗,乃押韵文耳。”(《梅溪后集》卷一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赵汝回《云泉诗集序》:“江西以力胜,少涵泳之旨。”(薛嵎《云泉诗》卷首,清嘉庆六年顾修读画斋刻本《南宋群贤小集》)

③ 《答杜仲高旃书》,《攻媿集》卷六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诚斋集》卷八〇,《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影抄宋本。

⑤ 《侄孙昺以东埜农歌一编来……因题其卷末以归之》,《石屏诗集》卷三,《四部丛刊续编》本。

⑥ 《东野农歌集》卷四,《石屏诗集》附录。

⑦ 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三,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 523、524 页。

人。”①良有以也!

再次,自杨亿自觉地选择创作典范、建立诗派之后,从此诗坛派别林立,而明、清尤盛。宋代的典范选择基本上仅限于前代某位大诗人,明、清则不然,除前代诗人外,诸如某个时期(如唐、宋等)、某种理念(如性灵、神韵等)亦可立派聚徒,诗派、典范滥矣。老杜尝言:“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②因此,“村夫子”论的出炉不是好兆头。在宋以前,诗人心中虽也有典范,但基本上没有自觉结派的冲动,而从杨亿首开风气之后,诗人们遂纷纷倚门傍户,选边站队,从而造成了诗坛的分裂,杜甫和“杜甫们”这些被选作典范的大家,也跟着被折腾。宋以降主流文学中的诗歌史,几乎成了诗派史。如果说典范选择在宋初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在欧阳修诗歌革新取得胜利、宋诗风貌基本形成之后,这种情况本该结束,然而文学史却告诉我们:典范的选择与再选择,仍将没完没了,负面效应也日趋明显。典范之争往往演变为诗派之争,彼此辩难,相互攻讦,诗坛从此多事,成了一道并不亮丽的风景,像博弈中一盘没有结局的“局”,直到古代文学的终结。

## A Discussion on the Choice of Poetic Model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ith its Gains and Losses
## ——Take Du Fu for Example

Zhu Shangshu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In the poetic circle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Yang Yi (杨亿) regarded Li Shangyin (李商隐) as the poetic model of Xikun School (西昆派); Yan Shu (晏殊)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Du Fu (杜甫); Ouyang Xiu (欧阳修) thought Han Yu (韩愈) unequalled, but didn't like Du Fu's poems very much; and Jiangxi School (江西派) considered Du Fu as the originator of poems.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choice of poetic model,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Du Fu's reversed status from a village teacher to the originator of poems. And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hoice of poetic model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ems, but inevitably has its limitations. So, the choice of poetic model is a double-edged sword which ha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s well as gains and losses.

**Key words**: poetic model, Du Fu (杜甫), Yang Yi (杨亿), Ouyang Xiu (欧阳修), Huang Tingjian (黄庭坚)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元好问:《遗山集》卷一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戏为六绝句》之六,《九家集注杜诗》卷二二。